

■新作聚焦

## 陶纯长篇小说《一座营盘》：

# 直面当下的现实主义力作

□汪守德

「陶纯的长篇小说《一座营盘》以某种颠覆性的姿态,勇敢直面当下的军营生活,以下手凌厉的解剖和摘除毒瘤般的锋利,在创作上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给这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某种可供借鉴的重要启示。

军事文学创作,特别是部队的作家,不能再耽于过去的幻觉,继续写那种早已物是人非、影像失真的虚假生活,在承担弘扬战斗精神这一使命的同时,同样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正视其存在的问题。用自己有热度、有分量,且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为军队激浊扬清、刮骨疗毒,祛除腐败颓废戾气,重塑当代军人魂魄。

「

现实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在较长的时间里都处在一种莫名的困惑与焦灼之中。在面对现实的问题上,作家普遍感到信心不足,不是羞羞答答、止步不前,就是无力问津、退避三舍,表现出不应有的却是可以理解的畏患与胆怯。但也有一些作家为职责和激情所驱使,仍在进行着勇气可嘉、坚韧执著的努力与探索。陶纯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一座营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就是以某种颠覆性的姿态,勇敢地直面了当下的军营生活,以下手凌厉的解剖和摘除毒瘤般的锋利,在创作上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给这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某种可供借鉴的重要启示。

作为军营旧称的“营盘”是个指向性、象征性都很鲜明的军事语汇。陶纯以此为题的写作,以正面的切入和强攻,为读者讲述“营盘”中的生活、人物和故事。地处龙城南郊的A基地就是小说虚构的这座现实的营盘,承载着作者对于军营的最现实、最切近的洞察。作者以30多年的时间为单元,对这座营盘和营盘之中的军人们进行了颇为冷静、犀利而有深度的观察、透视和剖析,使之呈现出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生活肌理,将当下军队现实的标本真实、痛切、震撼性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一座营盘》给人印象最深的,当是其成功塑造的人物和与人物相关的那些事儿。布小朋与孟广俊是一对同年入伍,性格迥异,一正一邪,品质天壤的人物。他们仿佛一人伍就

有了某种天然的分野,而经过漫长军旅的风雨历练与人生抉择,最终收获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作品以纯熟老练的笔墨,勾画出两人不同的从军道路、性格特征与价值取向的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在坎坎坷簸的人生历程当中,布小朋在艰难的处境中始终选择了对于底线的坚守,而孟广俊则在芜杂惑乱中颇为适应地选择了放纵。两人所备尝的滋味各异的喜与悲,都是这片土壤结出的果实。以两人时而平行、时而交集的命运为主干自然向前延伸,作品所呈现出的是军营的众生相,是军营的现实生态,是看似影影绰绰却也隐藏着无穷奥秘与玄机的运行规则,是这种规则之下已经发生局部蜕变的肌体和质地,其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也就深刻地体现了出来。

主人公公布小朋是作者给予正面肯定并寄予理想与热望的人物。本是地主成分的他,由于接兵副连长康文定与其姐姐布花的“交易”而走向军旅。在布小朋离家从军的前夕,姐姐布花在父母坟前要其起誓永远留在外面世界不再回来,其情志的决绝折射出了出身贫寒之家的子弟的悲苦与艰辛。布小朋从站哨、带班,到基地康又汉司令家当公务员,后因与康司令之女莉莉之间莫名的关系而惊险异常地提了干,开始走上了一条艰难坎坷但终究轨迹向上的路。或许是曾经的悲苦命运造就了他的虔诚敬畏之心,在军营中,布小朋能够始终保持高度清醒与自觉的意识,矢志不渝、一根筋似的坚守着自身的立场与品质。他工作在财务部门时,告诫自己“不当账房先生”,对部队“很多钱不该花,但又不得不花,没用到正道上”的痛心现象,在无奈中不讲情面地进行着抵制。在担任606仓库主任职务时,他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凭着一股不合时宜的、认死理的牛劲,以清正的品格与作风顶住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歪风邪气,硬是把这个问题成堆的落后单位带出了泥潭。他到三师九团当团长,按实战要求拉动演练部队却因遭遇大雨而发生伤亡事故,在有人试图将其坏事变好事地树为典型时,即便因此被“晾”起来,也坚决不改其不愿做假的初衷。对夏忧这个梦想很高、见解不凡,却不合时宜、颇为另类的部属,他极尽了点拨呵护之能事。姐姐布花凄然病逝后,关乎惟一外甥牛牛的前途问题提了出来,在私人情感与组织原则的矛盾与纠结中,他始终不放弃对原则的坚持。虽然常常不得志,不被理解,且都闷闷胸,却依然故我,不改初衷。他之所以能够磕磕绊绊,一路走好,直至升任后勤部长、师长、司令之职,充分表明部队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其人品和努力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可。同时,康司令那样正直耿介、胸怀磊落的军队领导,是其真正精神的支柱与知己,始终支持、激励他勇敢决绝地走下去。

与布小朋唱对手戏的孟广俊,是小说刻画得最为真实饱满、活灵活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作者从军营生活中了解和掌握许多负面素材,几乎都赋予了这个人物。这个出身乡间、藏身军营的人物,比一般人要更为成熟世故,悟性高、脑子活,且深谙社会与军旅人生的个中三昧,懂得和善于走关系,找窍门,抱“大树”。甚至在找对象的问题上,“一直瞄着领导家的姑娘”。他从连队“上士”这个日用物品采购员滋润的“肥差”做起,竟然能够顺风顺水,一步一个台阶地逐渐接近实现他当中将的大志。在他的身上集合了精明势利、张扬显摆、胡作非为等种种特征,如:报各种账目时总是“往大了报”,以中饱其私囊;当后勤部副部长进京要钱时偷

偷携带电视台女播音员一同前往;把故乡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孔老前辈”接到基地医院院长住供养,为的是讨得“大首长”孔家瑞的欢心。其小人得志式的命运及其为人不齿的所作所为,正反映了部队实际存在的种种问题。孟广俊身上折射出的军队贪腐之风,严重地侵蚀着这个本应是战斗的肌体,而这恰恰给孟广俊们的自由呼吸与肆意驰骋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渠道。这是一个孟广俊能够如鱼得水的土壤,其行为反过来又使这块土壤被严重毒化,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忧虑。小说写到这个人物的最终倒台与被起诉,既可视作军队现实和一些人下场的真实写照,又可提振人们对于军队的信心。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小说都是接地气的写作,有着可靠的社会学基础作为支撑。

我以为忠实于生活的创作态度和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是小说获得力量的真正奥秘所在。小说对官场人物和规则的勾勒可谓神毕现,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如为投总部江副部长所好,孟广俊煞费苦心地做出一碗滋味纯正的臊子面;接待大首长时用不断更换的方式,始终在桌面上保持所谓“四菜一汤”的心计;用100副军车牌照给个体户搞运输赚钱,甚至用飞机做走私汽车生意;下功夫为基地搞到连龙城市委书记都望尘莫及的特供茅台酒,并且始终在车子的后备箱里放着以备关键时刻派上用场……这些似乎司空见惯、俯拾即是的一个个事例,已经形成愈演愈烈的风气 and 影响人民军队肌体健康的毒瘤,到了应当加以遏止与剪除的时候了。

陶纯笔下的这座“营盘”,从开始时的小溪初成波澜不惊,到最后几乎是令人惊愕的巨大人生和命运的变迁,其间通过对生活的照相式写实,对军队官场的无情解剖,对人性的明晰参透,让人处处惊心,扼腕惊叹。作者笔下所描述的这一切,都是对所见所闻的秉笔直书,都是现实图景的真实呈现,并不需要背离生活去进行刻意的虚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营盘只是所有营盘中的“这一个”,是一个极具概括性和象征性的缩影,概莫能外地受到社会风气以及军队自身流弊的影响。那些令人痛心的人和事的发生,有的是对社会流行做法迅速有效的复制,有的则是本身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所致。我们在由衷赞叹那些军魂永驻、高风亮节的军营人物的同时,更对那些歪风邪气感到忧心忡忡。所幸作品中所反映的种种令人扼腕的现象,正得到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大力重视。

这部小说的问世,深刻地表明了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军队由于在当下接连曝出的种种问题,不能不承认其昔日的光环受到很大的损害与衰减。军事文学创作,特别是部队的作家,不能再耽于过去的幻觉,继续写那种早已物是人非、影像失真的虚假生活,在承担弘扬战斗精神这一使命的同时,同样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正视其存在的问题。深刻准确地揭示军营的真实生态,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当代军营中的真实人物,用自己有热度、有分量,且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为军队的激浊扬清、刮骨疗毒,祛除腐败颓废戾气,重塑当代军人魂魄,贡献一份特殊的智慧与心血。从这里出发的当代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将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和更大的作为,也将会赢取更多读者的信赖与赞许。从这个意义上讲,陶纯的长篇小说《一座营盘》既是一部得风气之先之作,又有着某种划时代的创新性意义。反腐之后的“世界变得干净了”,但愿小说的最后期许,能够成为切近的现实。

■创作谈

现在回头总结,自己爱上文学创作,与上世纪80年代初读过王蒙、刘心武、张贤亮、李国文、蒋子龙,以及军队作家徐怀中、李存葆等人的小说有极大关系。这些作家当时最大的特点是,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上写作,勇于揭示民族的苦难,反映人民和社会的疾苦,点燃被压抑的人性光辉,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现实,让文学走在了时代前列。那个时候我读到的中国小说,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充沛的文学激情相融汇,作家敢说真话,尖锐大胆,禁区一个个被突破,读来痛快淋漓。

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多元文化的爆发和大众娱乐的狂飙突起挤占了文学空间,读书人越来越少,文学后备力量流失严重。作家本身有没有责任?我认为,责任不小。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不少作家写作越来越小众化,不关心现实,远离时代,缺乏担当,热衷于描写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笔下不痛不痒、自说自话、顾影自怜。其结果就是,你不关心时代,时代就会抛弃你;你不关心大众,大众就会抛弃你;你不关心生活,生活就会抛弃你。

作为军旅作家,不能去描写基层官兵的精神苦闷,反而要不断重复以前的作品,不停地去写他们所谓的奉献精神、虚假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我看不到创作的希望。2003年前后,我暂时放弃了小说创作,开始写剧本。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知道的人多一些,辛辛苦苦写一部小说,能真正去阅读的人少之又少;写一部电视剧,只要能在卫视播出,就会有成千上万人观看,这也是一些作家转行写剧本的原因之一。

在影视圈里折腾了十年有余,个中滋味,冷暖自知。在参与写作了8个剧本之后,我开始怀念文学创作。当然,回头写小说,是不能再写过去那种不疼不痒、不咸不淡的东西了。虚假和苍白无力,一直是军事文学的通病。作为一名老兵,我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军队的巨大变化,说实话,现在我们的战力、武器装备发展之快,连内部人都感到吃惊。但是,我们最大的心病是腐败,腐败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写30多年军队的变革,如果不涉及军中腐败,如果有意忽略这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一个军队作家的失职。我不想粉饰现实,不想回避矛盾,我想改变过去军事文学高大上的传统,把军人拉回到地平线。于是,我写出了部队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形式主义、用人不察、面子工程、缺乏科学的决策、讲排场、惊人的浪费、买官卖官等种种腐败现象。这些大都是我听说过的,遇到过的,身边发生过的。

我和书中主人公公布小明有类似的经历,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像我们这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家子弟是难有机会成为职业军人的。16岁那年我来到军队,30多年来,国家军人养育了我,我总想着为军队做一点事情。我是个文人,不能到训练场上摸爬滚打,掌握不了高科技武器,无法到边境线上站岗放哨,那么,只能利用手中这支秃笔,写几部作品,回报国家和军队。军队是镇国利器,军队强,国家才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应该是军事上的复兴,没有军事上的强大,中华民族的强大与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真正的作家应该勇于立于潮头。中国作家缺少的不是才华,而是勇气和担当。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怕三怕四,是我们作家,包括出版人的通病。我们所站的高度不高,太关心身边琐事,而不怎么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缺乏大格局、大思维。这就不免影响到我们作品的高度和质量,大作品也许就这么溜掉了。

我不认为《一座营盘》是一部反腐小说。我只想让读者通过它,关心一下中国军队的现实,进而思索一下国家、民族的命运。对于我而言,能够站在风口上,去写一部以前别人不敢碰的题材,算是尽了自己作为一个军队作家、一名35年老兵的职责吧。

迎着风浪前行

陶纯

■评 论

## 《第五战区》：面对如此广阔的世界

□叶 梅

中。在小说中,作家借用小说人物鹿景修之口提出,“这是一场改变了中国抗战历史的决定性战役,同样也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

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南沂蒙县的人们自然也不例外。小说中,无论是富甲一方的乡绅还是渴望拥有土地的佃户、走街串巷的手工艺人,面对无法逃避的战争,都决绝地挺身而出,一步步走向民族大义,诠释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豪情,而这正是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精神。《第五战区》努力呈现“真实的人性善恶丑丑、真实的命运波谲云诡”,突破了传统的抗战文学叙事,丰富了抗战题材军事文学。

文学作品是对人类丰富的思想感情的忠实记录。从《诗经》《楚辞》到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小说,汉语文学一直传承着作家与时代休戚相关、与社会发展共命运的伟大传统。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但是近年来当代文学创作却存在着越写越“小”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题材内容的狭小、价值观念的卑琐、技巧的刻意雕琢等。面对如此广阔的世界,作家却只关心自己的得意和委屈,画地为牢,忸怩作态,很少关心人类,关心周围的世界。这样的眼界和胸怀,如何期望写出作品的“大”?

作为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常芳的创作扎实绵密。《爱情史》《桃花流水》直面现实社会,在不动声色的批判中充满温情书写与诗意建构。《第五战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久违的广阔的文学世界。在小说中,常芳没有大幅幅地描写战争场面,而是把抗战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从标枪化写作、程式化写作中还原出来,把战争的残酷、人性的高贵、历史的吊诡和命运的波折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人物丰富,题材宏大,接地气,有温度。小说没有写普通民众表面的慷慨悲歌、义无反顾,而是从人性的悲切切入,写他们的狭隘、宽容、愚昧、无私、懦弱、勇敢。超越战争写战争,才能真正写出战争的残酷,立体呈现战火映照下的复杂人性。

在《第五战区》中,常芳充分借鉴了古典小说“书中暗表”的叙事方式,努力营造一种打破正常的时空次序,使穿插在小说中的几十处人物、情节与小说内容浑然一体,把人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归结在一起,让人

物跌宕起伏的命运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一个有机部分,使小说阅读起来更加兴味盎然。

“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弦缓不鸣,弦急声绝。”《第五战区》中关于农民与土地、侵略与抵抗的这些理解,包含着对传统哲学思想的坚守,与其说是小说主人公自己的解读,不如说体现了作家本人的价值关怀和对当下社会的另一种批评。对传统道德理想的弘扬,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哲学探寻的意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五战区》对沂蒙山区人物风情的描摹以及穿插其间的民间传奇,都丰富了这部作品内在的魅力与叙事张力。“天空中的云像新翻开的犁沟,又像奋力朝前游动的鱼群,云层间布满了彩霞。那些茄子色,豌豆色,黄豆色,梨花色,樱桃花色,熟透的花椒色,通红的柿子色,火焰一样透红的高粱色,所有这些颜色,仿佛是被人在盛在一个硕大无边的罐子里提了来,然后一下子倾倒在了那里,它们就无拘无束地顺着那些犁沟和鱼群,无拘无束地蔓延流淌了出去……”这些对沂蒙山区天空中飘浮的云朵的描写,使小说既立足坚实的大地,又具有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变幻的云朵成了生活的隐喻。小说中几十处关于云朵的不厌其烦的描写,与人物命运和战争战事交织在一起,让生活在苦难大地上的人们不再只是一味地忍受与忍耐,而是不时地抬起头来,仰望天空,寻求希冀与梦想。虽然历经苦难,但是永远不绝望,不放弃,直到迎来最后的胜利。

##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新作快评

### 陈崇正短篇小说《碧河往事》《收获》2015年第1期

「历史」如何雕刻「当代」陈崇正的新作《碧河往事》处理的是“当代”与“历史”、创伤记忆与当下现实之间的扭结和纠缠。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周初来领导着一个乡村潮剧团,人才辈落,设备落后,常辗转于各地乡间的祭神节度勉力维持。当周初来偶识有唱戏功底的韩芳时喜出望外,将其招入团中。小说中的周母有些神神叨叨,她时刻担心当年的潮戏女旦陈小沫的鬼魂或家属会来索要自己手上的手镯,据她自己说,当年批斗“四旧”时,她带头批斗陈小沫,并夺走了她的这只手镯。在这种半幻觉状态中,周母认真观看了韩芳演出的《金花女》,她入戏落泪,邀请韩芳吃宵夜并为韩芳说戏。但同时,她又惊恐地怀疑韩芳便是陈小沫的女儿,以此要求韩芳退出剧团。周母扬言可以替代韩芳演出,并亲自演唱了一段《金花女》,人们惊觉周母原来如此懂戏。之后不久周母谢世,小说最后,周初来为母亲的墓碑忙碌,读者于是惊讶地发现:原来周母墓碑上刻的名字竟是陈小沫。小说最后设置的意外如一处强烈的光源,重新定位了小说的意义,使读者不得不重新回头思索第一次阅读时等闲视之的细节。这番叙事上的匠心独运当然可圈可点,然而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我们重读小说时与作者丰富而又无苦湿的现实、历史思索的相遇。

小说对周母/陈小沫这一人物进行了分身叙述,值得追问的是,这种遮挡式的叙事难道仅仅是为了“创造意外”吗?多年以后,被迫害者陈小沫为何将自己牢牢锁定在迫害者陈丹柳的位置上?这种设置隐含了何种深意?晚年的周母似乎患有人格分裂症:作为被迫害者,也许由于恐惧,她需要将自己认同为迫害者陈丹柳才觉安全。然而,当她处在迫害者的位置上,她又时刻受到往事的折磨,感受着另一种恐惧:被迫害者的报复。所以她必须不断为“迫害”辩解。

《碧河往事》将历史创伤记忆投射在一个无限归结、具有深刻精神分析内涵的形象之上,已经令人击节;更重要的是,陈小沫的分裂和纠结,事实上正是多种不同伦理话语的撕裂和对峙。在我看来,《碧河往事》存在着某种不动声色的“悲剧感”,而这种悲剧感始终在分裂和搏斗中。多年以后,历史看似过去了,陈小沫的“柔情抗恶”却始终不能疗愈自己的心理创伤。这也许何以周母无法居于有情者陈小沫的位置上安然自处,而时常将自己想象为施暴者陈丹柳的内在原因。

小说通过双线叙事、命名隐喻等方式,使作品获得广阔的当代纵深感 and 现实批判立场。世事沧桑,但历史未被有效清理,人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身份马甲穿行于世界上,作者对这种现象的现实忧患是小说的真正看点。

陈培浩